

國文精選叢書

葉楚傖
劉延陵
胡倫清

主編
編註
校訂

明清散曲選

正中書局印行

序言

從東漢末葉到清朝滅亡的這一千七百多年的中國散文史，可以概括地劃分做兩個時期。就是從漢末到初唐的以綽麗著稱的八代文時期。和從韓愈到清末的『古文』的時期。被司馬遷首先使用的『古文』這名詞，到了韓愈的時候，是專指宗主三代、秦漢，而和八代文對立的那一種比較簡樸的文體了。自從韓先生擎起了這幅大旗，以起『八代之衰』後，牠從此就在中國的文壇上，飛舞着，支配着，一直到最近十幾年之前才被人卸落下的。在這個延展到一千一百年的中間，中國做散文的人是沒有誰敢不站在牠的下面，也沒有誰不以站在這裏爲榮的。所以中國散文史上，這一個長時期都是『古文』期。

可是這期間，『古文』的內部卻曾有過若干次的波瀾與變化。這大半是發生於明、清兩代；因爲唐朝末葉和宋朝元朝的許多作者，雖然風格各異，但大都宗主韓愈而且不曾樹立過森嚴的壁壘互相對抗；惟有明朝，卻曾有好幾個派系此起彼仆地鬧了整整的二百多年；清朝也有一個很長的期間拋棄了單純的『古文』名目，另外樹起一個番號以代表那期間的散文。所以講起中國近

代『古文』的發達史來，明、清兩代的值得注意，是不下於宋、元的。

明朝的散文的演變分好幾個階段。

首先是太祖開國的時期。這時候最著名的作家有宋濂、劉基、王禕、方孝孺等人。濂的敷腴闕肆，基的俊奇多姿，禕的平易和緩，孝孺的縱橫豪放。這一種近於『陽剛』的風調，與其說是受了明朝開國時蓬勃的朝氣的感染，還不如認為各個作家個人性格的表現與所受教育的結果。

其次是成祖以後的太平時期。從成祖永樂年間經過仁宗、宣宗、英宗三代，在明朝是一個比較安樂的時候。這一種安樂的氣息本來就很容易傳給文學，造成一種和平典雅的風格。加以這時中央政府裏又有三位內閣大臣，做起文章來全都是歐陽修一派的雍容紆徐的調兒，所以安舒的作風就更有有力地被推揚開來。他們就是被後人稱為『三楊』的楊寓、楊榮、楊溥。他們這種文體，因為創始於『金馬玉堂』『丹陛紫垣』之間，所以後人又稱做『臺閣體』。

臺閣體的好處是從容安閒，但牠的末流卻變成膚廓空虛。本來明朝從太祖以『八股文』取士以後，中國的文人為圖富貴功名起見，已經天天在哼那一種有腔調而少意義的文章；現在大家

寫起『古文』來又都是這麼有氣乏力澹泊無味，於是依照『物極必反』的道理，就自然激起一派對抗的勢力來。這一派崛起於孝宗弘治、武宗正德年間。他們主張雄邁生硬以藥臺閣體的萎弱平庸，奉唐宋以前的『古文』大家來壓倒疏淡平易的宋人。他們的口號是『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』。他們的中軍是李夢陽、何景明、徐禎卿、邊貢、康海、王九思、王廷相七人，就是所謂『前七子』。雖然他們的作風一新當時的耳目，而他們卻是過分著意於文格的雕飾而忽略了牠所表現的情意；所以論他們的態度，根本就認錯了文學的功用；論他們的作品，最好也不過是些假造的漢鼎秦鐘。

於是到了世宗嘉靖年間，就有四位有名的文人發出反抗的呼聲。在前的是王慎中和唐順之，稍後的是茅坤和歸有光。他們都提倡做唐宋人的文章。雖然摹倣唐宋和剽竊秦漢是同樣地仿古，但唐宋人的文章既然和明朝的口語比較相近，他們的主張也就自然是比較地合理。

這許多人中，最有成績的是歸有光：他以平易的文字寫家庭社會間的瑣事，神態生動，風韻悠遠，學歐陽而能化，有三楊的明白而不同其空虛，雖然他的文學作品也祇是些單篇的散文，但論他的見解和作風，卻不能不算是高人一等的。所以後來黃宗羲還引別人的話稱他『爲明文第一』哩。

當這四位的主張得到一部分的文人的同情之時，復古派的氣燄依然未熄；所以又有一個團體叫做『後七子』的樹立起來，表示要追躡『前七子』的高風。後七子就是李攀龍、王世貞、謝榛、宗臣、梁有譽、徐中行、吳國倫，第一位和前七子的魁首同樣姓李，不能不說是一件有趣的巧合。他們的主張和前七子完全是一鼻孔出氣；他們的『文自西京，詩自天寶而下，俱無足觀』的標語，和前七子的『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』的口號，旨趣完全一致。但倡導的人還從文章的氣魄精神上用功，而後來的這班徒弟卻專在形貌上雕飾，割裂字句，硬填生砌，製成的又是紙糊的商鼎周彝了。

這兩派對峙了四五十年。到了神宗萬曆的中葉，又有一枝生力軍起來和前後七子對壘。那就是稱為公安派的公安地方的袁宗道、宏道、中道兄弟三人。他們以抒寫自我的主張來抵制對方面仿古的呼號，以清新輕俊的作品與後七子的板重相抗衡。他們主張屏絕摹擬，由作者各以自己獨特的風格抒情達意。這本是一種最正當的主張；但因那時候大家都蹈故襲常，習非成是，所以牠終未能感化反對派因襲的見解——這些人是堅信不摹仿秦漢就得效法唐宋的。加以三袁自己又有一個弱點給反對者做攻擊的藉口：就是他們的作品，除去很少數的篇章以外，都缺乏深摯的情感，而且他們祇知道不當摹仿，但他們除去有一點清新的氣息而外，卻不會能夠創造更具體的新

的好的風格，以抗衡對方方面由摹擬得來的技巧；所以他們的作品有許多像是隨便寫成的。於是反對者就把牢這一點以指證他們的淺薄。不過，撰作與主張終究是兩件事；三袁的作品雖不算好，但他們的主張，卻是優越的，優越於剽竊秦漢的前後七子，也優越於步武唐宋的王、唐、茅、歸。

同時和公安派的清俊表示異議的，有竟陵人鍾惺、譚元春，又故意走向幽深孤峭的一路。他們被稱為竟陵派。他們在不摹擬秦漢的這消極的主張上，雖和公安派立於同一戰線，但他們的積極的主張是比較地不自然的，影響也當然就比較地小了。

從公安、竟陵，到明朝亡國的這五十年就是文學史上所謂『明末』。這期間，除去上述的二派和正統派裏幾個比較著名的作家如錢謙益、艾南英、張溥、陳子龍，幾位外，別的就是現代所謂『晚明小品文』的許多不甚著名的作者了。這後面的一羣，對於文學的見解比較和公安派相近，所以他們的作品都有逍遙瀟脫的風調；但因他們也具有公安派的缺點，所以也就多美句而少完篇。

在學術方面以考據和駢文見稱的清朝一代的『古文』，論質論量雖都不弱於明朝，而講起派別的起仆來，是沒有那樣曲折可觀的。

清朝的『古文』在開國初年和以後康熙、乾隆、嘉慶三朝最是興盛；因為起初，有大批明朝遺留下來的文人學者，後來又因為籠絡漢族起見，開博學鴻詞科和編纂許多大部的書籍，在學藝上確有蓬勃氣象。

清初有一批不以文人出名而文章亦復可觀的學者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稱為『國初三老』的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。王與黃的文章俱能自抒機軸，不守門戶。顧則有比他倆更好的文學作品與更徹底的見解；他在名著日知錄裏指斥文人摹擬的話，是很有價值的。

同時最以文章著名的又有侯朝宗、魏禧、汪琬，組成的所謂『國初三家』。侯得力於史記，浮誇閎肆而善於敘事；魏學左傳與蘇洵，縱橫雄健而精於說理；汪步武歐，曾疏淡紆迴而亦長於傳記。汪的文刺激性不及侯、魏，但從容不迫雍容爾雅的態度，則上接唐、歸，下啓桐城，在以後的清代古文史上有很大的影響；所以他的地位，是不可忽略的。

同時著名的文人，還有金人瑞、王猷定、邵長蘅、姜宸英、朱彝尊、彭士望等。中間最值得注意的是金人瑞：他的文筆迴環往復，縱橫疏暢，無不達之意，不盡之情，雖有時排比過多，枝節橫生，但就大體而言，掃除依傍抒寫自我的見解，是和公安派一脈相承，卓然自成一家的。

乾隆、嘉慶兩朝的散文家以鄭燮、章學誠、袁枚最堪注意。鄭敢在大家都做『古文』的時候，做白話式的文章，那種大膽的嘗試，是值得欽佩的。章把歷來文人仿古摹今的習氣，駁擊得體無完膚，提出『清真』二字做作文標準，這種精神和見解，也同樣地值得敬服。他說：『古人文成法立，如語言之有起止，啼笑之有收縱，自然之理，豈有一定式哉？文而有式，則面目雷同，性靈錮蔽，而古人立言之旨晦矣。』袁論詩論文，都主張屏絕依傍，自寫『性靈』。他在隨園詩話和許多散文裏對這方面的議論固然警闢；他的作品也能融貫百家，自成一種可愛的風格。總之，這三位對於文學的見解，也可說是公安派。

但清朝的散文並不是一直沿這些開明的文人所經的路線展開的；因為，上文說過，『國初三家』中汪琬，已先決定了清朝古文『正統』的歷史了。汪是屬於歐陽修、曾鞏那一派的。稍後有方苞，方之後有劉大櫚，劉之後有姚鼐，也都循他的蹤跡走去。因為這後面的三位都是安徽桐城人，於是以姚鼐作為這個系統的大師的所謂『桐城派』就成立了。論到這一派的作風，大概不外乎『味淡聲希，整潔從容。』優點在辭語平易近人，缺點在故意做出一唱三歎吞吐不盡的神氣，不敢有一點兒大聲壯語，豪氣熱情；牠和已往的古文宗派雖都不盡同，但實際上是以歐、曾為始祖，沿明朝的

三楊、唐、歸、和清朝的汪琬這個世系產生出來的。姚鼐的及門和私淑弟子很多；在姚氏負盛名之後約一世紀中，古文的壇坫，算是由他主盟了。

桐城派的末流，也和明朝臺閣體の後裔相似，變得枯虛無味；因此不久就有兩個異派產生。一個是於遵守桐城的義法以外，更帶點縱橫矯厲氣息的，以武進張惠言、惲敬做宗師的所謂陽湖派；一個是學戰國策的縱橫，韓非的廉悍，以地理掌故世情民隱做質幹的龔自珍和魏源。龔比魏更有名。龔氏策畫考據的文章，對於一般讀者，雖屬艱深；但是帶點矯健潑辣氣息的小品文，卻是雋永有味的。

龔和魏是橫跨在乾隆、嘉慶、道光、三朝的人。在嘉慶末葉誕生了曾國藩；咸豐和同治年間是他的全盛時期，他推崇姚鼐，而同時也歎息桐城末流的孱弱，於是就主張以深宏的氣息和駿邁的辭語來輔佐姚氏所立的義法。曾氏位高望重，門下又有許多文士，所以就造成了新的文派——湘鄉派，實際是桐城派的復興。這派的健將是薛福成、張裕釗、黎庶昌、吳汝綸……幾位。支配了中國的文壇四五十年，一直到光緒朝的後半期才漸衰落——那期間又有一枝生力軍出現，對歷來仿古的文人做了一回大結算，給現代的新文學運動做了開路先鋒。那就是『今文運動者』的譚嗣同、康

有爲、梁啓超幾位。

中間當然是應以梁氏做代表的。他的文章縱橫酣恣，說理明白，感情豐富；復時時難以經史子語、佛語、耶教語、俚語、韻語，及外國語法；祇求表現的方便，不守一派一系的戒律；雖然有時候排比過多，堆砌過繁，且帶些不必要的緊張語調，近乎金人瑞的缺點，但是痛快淋漓，卻是『瑕不掩瑜』的。他的文章具體地說明了歷來文人摹擬習慣弊病，文學的應向前開闢，不必回頭搜求。中國文人的深固成見，逐漸革除，實爲後來白話文學運動的先導。

敘述了明清兩代的散文的演化之後，我覺得有四點意見：

第一、文學上宗派或風氣的產生，大概有兩個原因，就是一時代的生活，及文人心理的傾向，明清之交的散文多寫忠烈之事，是因爲『易代』之際這種事實很多；梁啓超的文章，以受歐化的日
文影響爲原因之一；白話文學的擡頭，以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加密接觸爲主要原因；這些都是時
代生活影響文風最顯著的例子。至於文人心理的傾向又分兩點。第一是文人的性格。個人性格很
能左右他的作風，歐陽修的紆迴清深的文字，一部分是導源於他從容明察的精神；侯方域的『任

使尙氣弛跡不羈』的天性，成作『奔放雄悍酷肖其人』的文章。但是更重要而有更大影響的，卻是文人故意推陳出新的動機。歷來文學評論者好像都覺到這一點。曾國藩在他的送周荇農南歸序裏說：『六朝隋唐以來，駢偶之文……久王而將厭，宋代諸子乃倡爲韓氏之文，而蘇氏遂稱曰「文起八代之衰」，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，物窮則變，理則然也。』這個『變』就由於人心的厭舊喜新。王國維在他的人間詞話裏說：『文體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習套，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。一切文體之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。』梁啓超在他的清代學術概論裏說，一切時代思潮的變遷，都經過『生、住、異、滅』四個階段（『生』是一個思潮掃除舊思潮而代之；『住』是牠的全盛期；『異』是這派中產生支派；『滅』是牠讓位於後來的思潮；）而且斷定這一半是由於社會的變遷與環境的需要，一半是由於『豪傑之士』的『欲』『推舊』而『創新』。但最足說明這一點的還要推明朝『後七子』的領袖李攀龍自己的話，他曾有句話表明他們復古的原因，叫做『擬議以成其變化』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因爲那個時代的散文，都是唐宋八家一派，詩都是宋人一派，所以他們才主張『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』。這樣說時，文學史上的派別，就是最頑固守舊的，也有可以原諒的方面，就是他們的本意都是爲的『創新』。不過。

第二、他們依舊是有過失的。因為他們忽略了兩個重要原則：第一個原則是：文學作品實質面（就是牠所表現的思想感情）的重要，是不下於形式面（就是做表現的工具的文字。）文學作品所表現的思想感情，應當真摯而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生活；具備這個條件的文學作品，縱使沒有做的技巧，是能獨立不朽的。就明清兩代而論，凡是讀書人，不論有無文學天才，為求功名起見，都須做文人的；既做了文人，為要有文章產出，又須做許多應酬倡和之作。因此他們的文章，大都不是應制式或準應制式的作品，就是風花雪月人云亦云的濫調。這樣，就談不到『真摯』和『表現時代生活』。他們既要標新立異，又不能使作品的實質充實，於是就祇有在文字形式上翻花樣了。形式上的技巧當然也很重要；但這時候他們又忽略了第二個原則，就是技巧應當向前開關，不應當一味向後摹倣。從周秦到元，不絕地有新的文體詩體出現；就是明朝，也嘗在戲劇方面創立了『南劇』；若專講散文，則從周秦到宋也是接連地有新的風調產生。這些事都明白地指陳文章的技巧，是可以向前開創的。但明清兩朝多數散文作家祇知道向古人乞靈。所以他們『由擬議以求變化』的動機，雖可原諒，而他們的認識卻是錯了：一錯於專在形式方面用心；二錯於惟知由摹仿以求新形。

第三、由上面的推究，顯出明清兩朝幾位特立獨行的文人都是可欽佩而且共有一貫的精神。

那就是公安的三袁、金人瑞、袁枚、鄭燮、章學誠、康有爲、梁啓超。他們的主張雖然措辭不同，而根本上卻有一致的認識：就是（一）文章應爲作者內心真實的表現；（二）文章的風格可以開創而不必仿古。第二點和上文所陳的第二條原則相同；第一點雖沒有說到上文第一條裏所說時代生活的表現，而卻認清了作者應有真摯的感情。

他們可說是明清散文史下層的一條芳冽暗流。到了民國年間，就湧出地面，變成現代新文學的一條洶洶大川了。因爲新文學的態度和立場與這一個行列的態度和立場，根本上是相同的。現代的文人，我想沒有誰不承認上述的兩條原則；就是新文學運動的發動者胡適氏的『八不主義』——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；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；三不用典；四不用套語爛調；五不重對偶；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；七不摹仿古人；八不避俗語俗字——和他後來用另一方式寫成的四個條件——（一）要有話說方纔說話；（二）有什麼話說什麼話；（三）要怎麼說就怎麼說；（四）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；（雖然『八不』中的第三項和四條件裏的（二）（三）兩條都應當是有條件的，但就這個主張的全盤立論，大體卻是正當的）——也與上面提出的一個行列一樣，是和上述兩條原則完全符合的。

聽說周作人氏也曾有新文學運動是繼承公安派的精神的話，我想他當然不是說這是有意的繼承。因為『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』，所以一種正當的道理，雖然有時候可以因為環境與成見的蒙蔽，不為多數人所了解；但牠，或早或遲，是總能被他們認識的。這可認為『真理不滅』的原因之一；而上述兩條原則在中國文學史上之時隱時現，時斷時續，終由暗流變為大川，也就是由於這個道理——就是人性脫離環境與成見的解放。人性的解放是近代文化史的基本精神；文藝復興、宗教改革、科學發達、政治上的立憲制度、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都莫非是這個精神的表現。文學見解的自由解放史，也就是這種精神的自然流露。

第四、真理的種子永遠在人心裏，不發育，不是由於環境（人類的時代生活）的阻遏，就是由於成見的遮隔。人類的某種演進，往往非待生活達到某個階段之時不能實現，譬如現代的新文藝，不能在中西隔閡的時代產生，就是無數事例之一。所以環境的確有很大的力量；因為牠的阻遏，人類演進，往往是循環的、曲折的、斷續的，往往一件很簡單明白的道理，也得經過幾百年或幾千年之久，才被普遍承認；像上述的文學史上最正當的見解，斷續遲緩的發展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。但我們卻也得承認，祛除成見的精神，就是開創的精神，也有很大的力量。例如唐時『古文』的興起，雖以

八代文的『久王而將厭』爲素因之一，而韓愈的議創卻是最大的發動力。沒有韓愈，則浮靡的八代文大概是要再繼續若干時的。相似地，明朝『前七子』的主張，雖然一方面可算是臺閣體的反動，但七子的非『擬古』則無從『變化』的因襲見解，卻是牠的更重大的原因；否則明朝的散文史，也就不致充滿了那些無謂爭執了。

人心是一個可笑的謎。大多數人的見解是因襲的：他們都不自覺地抱着現在和將來應隨從過去、個人應隨從羣衆的心理；過去祇有很少數人能夠擺脫這種束縛。例如政治生活的演進，當然以世界主義爲最合理而自然，但過去歷史上已演過多少次的分合聚散，但是現代國際政治的演變，仍舊是極矛盾怪謬的。這些事一方面發源於人類的生活狀態，一方面也由於我們的頑固的心理。有人以爲必須經過大屠殺大破壞之後，這個世界才能走上更好的軌道。這是相信環境自然推演力者的說法。但我以爲如果無形地襲故蹈常的人減少，而自由獨立地思想的人增多，則人類的文化演進，是可以更直捷一點的。在國際政治方面如此，在別的許多方面上也是如此。

現在是從明清的散文發展史談到和牠距離很遠的題目了，不得不帶住已經踏上了歧路的馬的繯繩。——編者。

